

张少康 著

刘勰及其 《文心雕龙》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张少康 著

刘勰及其 《文心雕龙》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张少康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9

(博雅文学论丛·邃密书名)

ISBN 978-7-301-17192-9

I. ①刘… II. ①张… III. ①刘勰(? —23)—人物研究②文心雕龙—文学研究 IV. ①K825.6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3423 号

书 名: 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

著作责任者: 张少康 著

责任编辑: 徐丹丽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192-9/I · 223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8.5 印张 265 千字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前 言

公元五六世纪,当欧洲的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发展进入黑暗、停滞的中世纪,在东方却出现了一位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鲁迅先生称刘勰的《文心雕龙》“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论诗题记》),并与西方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媲美,这是并不夸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心雕龙》更有许多超过《诗学》的地方。它显然比《诗学》有更为严密的理论体系,更加丰富的具体内容。它既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文章学著作,又是一部文学史、各类文章的发展史,而且也是一部重要的古典美学著作。现在,大家把对《文心雕龙》的研究称为“龙学”,这是它当之无愧的。

刘勰的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既博采众长,又富于独创性。我们应该对他的家世、生平和思想,他的文学理论体系,他在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的贡献,以及他的文学思想的历史渊源,作一个全面、深入、具体的探讨和分析。这是笔者所以要写这样一部书的宗旨。然而,要做这样一件工作,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是有很多困难的。这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要对刘勰的文学理论体系本身作出一个符合实际的全面论述,是不容易的。因为目前学术界对刘勰的身世和他的文学理论,虽然已经有了相当深入和广泛的研究,在二十世纪出版了大约二百多部专著和将近三千篇研究论文,但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仍颇多分歧,对有些重要的理论概念尚无基本一致的认识。第二,刘勰学识渊博,他的文学思想涉及的面很广,接受历史上的思想资料也特别多,与中国古代许多重要的学术思想、文艺思想有密切关系,要论述刘勰文学理论的历史贡献与思想渊源,就要认真研究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艺思想、美学思想,而这是非常复杂而困难的问题。本书就是想在总

2 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

结和分析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对一些重要的、有分歧的、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新看法。

1987年山东齐鲁书社曾出版了我的《文心雕龙新探》一书,后来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又出版了该书的繁体字本。二十多年来,随着“龙学”研究的发展,许多问题已经讨论得更为深入了,而我自己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也有了不断新的看法。经过历史的考验,虽然证实了我原书中的不少论述和观点是正确的,但也更清楚地看到了很多地方尚不够全面或不尽妥当,有许多应当论述的问题没有论述,同时我也想介绍目前研究中的各种不同意见,并且努力作出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提出我自己的看法。此外,也需要对近十多年来“龙学”研究中提出的一些新问题谈谈我的认识。包括有关《刘子》是否刘勰所作,以及已经出版的某些刘勰传的写法等。因此,我决定在《新探》的基础上写一本全面研究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新的著作。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刘勰的家世、生平和思想	(1)
第一节 关于刘勰的籍贯和家族谱系	(2)
第二节 关于刘勰父亲刘尚及其任越骑校尉和去世的时间	(7)
第三节 关于刘勰的生年和入定林寺的时间与原因	(9)
第四节 关于刘勰入梁后的仕宦情况	(16)
第五节 关于刘勰的卒年	(18)
第六节 关于刘勰的思想和著作	(22)
第二章 刘勰的文学观念和《文心雕龙》的体例	(39)
第一节 《文心雕龙》广义的“文”和狭义的“文”	(39)
第二节 《文心雕龙》的体例和结构	(54)
第三章 文之枢纽	
——文学本体论	(59)
第一节 《文心雕龙》的原道论	
——论文学的本质和起源	(59)
第二节 《文心雕龙》的征圣、宗经论	
——论文学的经典范本	(70)
第三节 《文心雕龙》的正纬、辨骚论	
——论纬书、《楚辞》与经典的异同	(73)
第四章 论文叙笔	
——文学文体论	(77)

2 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

第一节 《文心雕龙》的文体论	(77)
第二节 有韵之文和无韵之笔	(85)
第三节 原始以表末 ——各类文体的历史溯源	(87)
第四节 释名以章义 ——文体名称的理论含义	(91)
第五节 选文以定篇 ——典范篇章的选择确立	(93)
第六节 敷理以举统 ——每种文体的创作要领	(95)
第七节 《文心雕龙》和《昭明文选》文体分类比较	(97)
第五章 割情析采 ——文学创作论	(109)
第一节 《文心雕龙》的神思论 ——论文学的构思与想象	(109)
第二节 《文心雕龙》的体性论 ——论文学的风格	(123)
第三节 《文心雕龙》的风骨论 ——论文学的精神风貌与物质形式美	(136)
第四节 《文心雕龙》的通变论 ——论文学的继承、借鉴与创新	(157)
第五节 《文心雕龙》的情采论 ——论文学的内容与形式	(169)
第六节 《文心雕龙》的文术论(上) ——论文学的写作技巧:结构布局和 比喻夸张	(180)
第七节 《文心雕龙》的文术论(下) ——论文学的写作技巧:声律、对偶、用典 及其他	(193)

第八节 《文心雕龙》的隐秀论	
——论文学形象的特征	(205)
第六章 披文入情	
——文学批评论	(223)
第一节 《文心雕龙》的时序论	
——论文学发展与时代的关系	(223)
第二节 《文心雕龙》的物色论	
——论文学创作的主观与客观	(232)
第三节 《文心雕龙》的才略论	
——论作家的才能和个性	(245)
第四节 《文心雕龙》的知音论	
——论文学的欣赏和批评	(248)
第七章 唯务折衷	
——文学研究方法论	(257)
第一节 《文心雕龙》和佛教哲学的方法论	(257)
第二节 《文心雕龙》的折衷论	(260)
第八章 《文心雕龙》和中国文化传统	(272)
第一节 《文心雕龙》和“天人合一”思想	(272)
第二节 《文心雕龙》和古典美学	(277)
后 记	(285)

第一章 刘勰的家世、生平和思想

刘勰和他的《文心雕龙》正在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然而,有关刘勰的家庭和生平事迹的资料,历史上遗留给我们的确实是太少了。对刘勰的身世及有关问题,虽经学者们多方考证和研究,也还有许多地方没有研究清楚,各家分歧也较大,即以其生卒年而论,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虽然不断有新的研究论著发表,然而,最为重要的还是杨明照先生的《梁书刘勰传笺注》^①以及牟世金先生《刘勰年谱汇考》^②一书。不过,他们两家在不少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相比较而言,杨笺虽亦有个别失误和值得商榷之处,但持论比较稳妥谨慎;牟著收集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海内外十多种研究刘勰身世的著作,参考了许多有关的研究论文,能够在总结各家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应该说是一部研究刘勰身世的集大成之作,但因考订有明显失误之处,有些见解就离谱了,故不能尽如人意。近年来我们能比较全面地了解台湾方面有关的研究论著,除了王更生先生的《梁刘彦和先生年谱》、李曰刚先生的《刘彦和世系年谱》外^③,有些牟世金先生当时没有看到的,如华仲麟先生的《刘彦和简谱》、王金陵先生的《刘勰年谱》等^④,我们都已经能够看到了。世金去世后,大陆学

① 杨笺最初发表于1941年《文学年报》第七期,后收入1958年《文心雕龙校注》。1979年作了重大修改,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后收入1982年《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又有修订。

② 1988年巴蜀书社出版。

③ 王著见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6年初版、1979年增订版《文心雕龙研究》,李著见台湾“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2年出版的《文心雕龙斟论》。

④ 台湾学生书局的华仲麟《文心雕龙要义申说》,1998年出版。台湾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丛书,王金陵《刘勰年谱》,1976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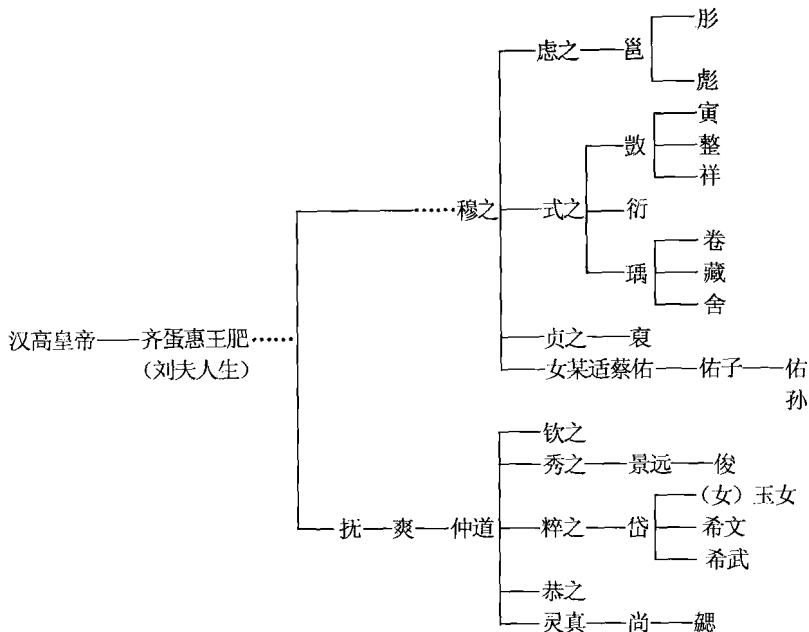
者也有不少研究刘勰身世的新著问世,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有可能在杨笈和《汇考》的基础上对刘勰的身世作进一步的深入论证。

第一节 关于刘勰的籍贯和家族谱系

《梁书·刘勰传》云:“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对这里所说的“东莞莒人”,有两种不同解释:一种认为是指刘勰祖籍山东东莞,如较早的霍衣仙《刘彦和评传》(1936年《南风》第十二卷)说刘勰“出生地为京口(即今镇江),今山东日照刘三公庄,莒故里也”。杨明照《梁书刘勰传笺注》云“舍人一族”“世居京口”,“夫侨立州县,本已不存桑梓;而史氏徇于习俗,仍取旧号”。一种认为是指南朝侨立的南东莞郡,在南徐州,镇京口,即今镇江。台湾的华仲麟、张严、王金陵、王更生均持此说。不过,《梁书·刘勰传》这种写法虽然指出了刘勰祖籍是山东莒县,但并不排斥他实际上出生于京口,从祖先南下后也可能一直“世居京口”。杨笈所说大致是正确的。但霍衣仙说“今山东日照刘三公庄,莒故里也”,容易被误认为刘勰出生于山东。现代山东的有些研究者也持此种说法,因为在三公庄发现一块清代乾隆时立的碑,碑文中间大字书:“梁通事舍人刘三公故里”。这显然是在刘勰出名后,当地人为光耀祖宗而编撰的。

关于刘勰的家属谱系,杨笈列有一表,王更生《年谱》在杨笈基础上略有增补,亦有差异,而杨新笈增订本又有补充,主要是根据王元化先生1978年为《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此文原写于1961年)一文所写的《补记》,据《刘岱墓志铭》^①补入了仲道祖父刘芄及刘岱与其一女二子。王元化先生是最早把刘岱墓志铭和刘勰家谱联系起来,并说明刘岱墓志铭对研究刘勰身世意义的。现综合上述几家之说列表如下:

^① 《文物》1977年第6期。



按：《宋书·颜延之传》云：“妹适东莞刘宪之，穆之子也。”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云：“洪颐煊《诸史考异》云：‘案刘穆之传，穆之三子，长子虑之，中子式之，少子贞之，无名宪之者。’按宪虑形似，‘宪之’或‘虑之’之讹。”繁体“宪”与“虑”确有形近而讹之可能，但也不排斥刘穆之还有一子宪之的可能。从这个年谱中，可以看出东莞刘氏系一大家族，由于《刘岱墓志》的出土，更证实了“抚——爽——仲道——粹之——岱”这一谱系是可靠的。在这个大家族中，像刘穆之、刘秀之在宋代曾为高官，死后赠列三公，食邑千户以上。这个谱系目前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是，正像牟世金在《刘勰年谱汇考》及他去世后出版的《文心雕龙研究》中所已经指出的，其中最大的一个疑点是刘勰的祖父刘灵真和刘秀之是否为亲兄弟，抑或仅仅是同出东莞刘氏一族而非同宗一系。如或确属后者，则此谱系对研究刘勰身世的意义就不很大了。对《梁书·刘勰传》中“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一说，首先提出怀疑的是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他说：“秀之、粹之兄弟以‘之’字为名，而彦和祖名灵真，殆非同父母兄弟，而同为京口人则无疑。”但是否

以“之”字为名,还不能作为是否亲兄弟的根据。因为沈约在《宋书》的《自序》中说:“(沈戎)少子景,河间相,演之、庆之、昙庆、怀文其后也。”其兄弟也并不都以“之”字为名。据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①一文所说,以“之”、“道”、“灵”等字为名,可能与信仰天师道有关。王元化先生也早就指出,刘勰一家和天师道的关系“确实值得研究”。(参见1983年《〈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值得注意的是《宋书·刘秀之传》仅说兄钦之、弟粹之(秀之弟恭之因受海陵王事牵连,故秀之传中未提及,事见《宋书·海陵王传》),包括《刘岱墓志》,均未提到有灵真。后来,王元化在《刘勰身世与士庶族区别问题》一文中,指出此谱系中所说刘氏系汉齐悼(惠)王肥后代不可靠,认为在南朝“专重姓望门阀的社会中,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编造一个做过帝王将相的远祖是常见的事。因此,到了后出的《南史》就把《宋书·刘穆之传》中‘齐悼(惠)王肥后’一句话删掉了。这一删节并非随意省略,而是认为《宋书·刘穆之传》的说法是不可信的”。王元化先生在《补记》中还指出:“《晋书》于汉帝刘氏之后,多为之立传。”“列传五十一中说:‘刘胤为汉齐悼惠王肥后’,但他的籍贯并非东莞莒县,而是东莱掖人。”(以上见《清园论学集》92页)1981年,程天佑在《刘勰家世的一点质疑》一文中提出:“《梁书·刘勰传》的‘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这句话,在《南史·刘勰传》中,完全删去了。”他以为这就是《南史》作者“认为‘失实’、‘常欲改正’的地方”。又说:“按照《宋书》的体例,如果秀之真有一个弟弟灵真,是不可能不记的。”《南史》的删节有多种原因,可是,这句话是体现其家族身份的重要关键,按《南史》的编撰方法是不应该删的。牟世金《汇考》中充分肯定了王、程之说,他说:“王、程二说是。晚出之《南史》以家传为体例,以同族通宗者合为一传。如《梁书文学传》共二十五人,《南史》将其中到沆等十四人合入家传,而不列《文学传》。穆之、秀之二人,《宋书》原分为两传,《南史》合为《刘穆之》一传,且将穆之子虑之、虑之子邕、邕之子彪,穆之子式之、式之子瑀、瑀之子式之,穆之从子秀之等,均合入此传。其中不仅无虑之、式

^① 见《陈寅恪史学论文集》。

之、秀之兄弟灵真、灵真子尚、尚子勰,还列刘勰入《文学传》而删“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句,则灵真与穆之、秀之本非同宗可知。衡诸刘勰一生行事及其思想,亦于刘秀之一宗无涉。”我们从南朝史书记载看,凡记载刘穆之、刘秀之一系的各篇传记,都没有涉及刘勰一系。所以,牟世金这个论断是可信的。《南史》编撰方法的最大特点是按门阀世族谱系立传,它对《刘勰传》的处理,充分说明了《南史》作者认为刘勰一系和刘穆之、刘秀之一系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从这个角度看,删除这句话确实有程天佑所说之意。不过,说刘勰和刘秀之一宗完全无涉也不尽妥善,《南史》所删《梁书》的这句话,与删《宋书·刘穆之传》“汉齐悼(惠)王肥后”一句一样,认为都有攀附名门望族而并不真实之意,但这两句话性质不完全相同,“汉齐悼(惠)王肥后”是虚指,而“宋司空秀之弟也”是实指,因此,后者不一定完全都是凭空编造,在攀附名门望族之外,可能还是有某些根据的。因为刘勰和刘穆之、刘秀之同属东莞刘氏,从家族谱系上灵真和秀之可能属同一辈而年龄略小,系远房兄弟,故而叙述得那么具体。但从实际社会地位和家属关系上说,刘勰一系和刘穆之、刘秀之一系,并无什么直接联系。而像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中那样据刘穆之、刘秀之的情况来说明刘勰是高门士族出身,根据就不充分了。何况,诚如王元化所已经指出的,实际上刘穆之、刘秀之位列三公,食邑千户,也没有被当时社会认为是高门士族,《南齐书·刘祥传》记载,刘穆之的曾孙刘祥就被人骂为“寒士”,祥亦不以“寒士”为耻。刘秀之一宗的地位比刘穆之一宗要低,所以,刘穆之的孙子刘瑀对其族叔秀之就很看不起,直呼其为“黑面阿秀”。(见《宋书·刘秀之传》)

不过,王元化先生认为刘勰出身于庶族看法,我觉得似乎还可以再研究。这里的“寒士”并非就是指庶族,而是相对于王、谢等高门士族(甲族)来说社会地位比较低一些的士族,他们一般不能当一二品官。刘穆之、刘秀之生前的最高官职只有三品,死后才追赠一品,所以,他们这一族就属于这种情况。唐长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①一书

①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的第二章第一节“南朝士族的结构及其衰弱”中说:“高门大族是士族的最高层,中正品第,所谓‘凡厥衣冠莫非二品’中的衣冠,就是指的这些高门。士族低层被称为‘寒士’、‘卑微士人’、‘士人之末’等。他们显然也取得了士族最基本的特权即免役,但在门阀序列中仍受到高门的蔑视,在作为门户高低标志的婚、宦上不可能与高门同等。”此点日本学者中村圭尔所著《刘岱墓志铭考》一文中联系刘氏一族的姻亲情况,也有充分的证据论述。^①他指出:“南朝时期,士庶的社会地位有很大的差别。士阶层的最上层称为甲族,寒士称为次门,次门位于甲族之下。但居于士阶层最底层的寒士又对于在他们之下的庶民阶层保持绝对的优势。‘甲族——寒士(次门)——庶’这种层次分明的社会构成与不同通婚集团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高门甲族与一般士族是不通婚的。按:《新唐书·柳芳传》云:“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这是说的南朝后期情况,萧氏在南朝初期并不能和王、谢相并列。王、谢、袁、萧和朱、张、顾、陆都属于高门甲族,但他们之间也往往互相看不起。如《世说新语·方正》篇记载:“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结援吴人,请婚陆太尉。对曰:培楼无松柏,熏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为乱伦之始。”王导为北方南下的王、谢高门,陆玩为南方顾、陆高门,陆玩就看不起王导。又如在萧氏称帝后,对南方大族就很看不起,《南史·侯景传》记载:“(侯景)又请娶于王、谢,(梁武)帝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至于南下的一般北方士族,如东莞刘氏、东海徐氏、高平檀氏、河东裴氏、东海王氏(琅邪王氏、太原王氏为甲族)等,则比北方来的高门甲族和南方当地的高门甲族都要低一等。所以,从《刘岱墓志铭》中可以看出,其姻亲均为高平檀氏、河东裴氏、东海王氏这一层次。刘勰一系属东莞刘氏,亦为层次较低的士族,因此,说他是地位低下的庶族出身恐怕不是很妥当。

^① 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

第二节 关于刘勰父亲刘尚及其 任越骑校尉和去世的时间

《梁书·刘勰传》对刘勰父亲刘尚没有详细的叙述,只说他曾任越骑校尉,早死。但研究刘尚的情况对我们研究刘勰的身世是很重要的。上面已经说过,刘勰父祖一系可能和刘宋时代官场显赫的刘穆之、刘秀之一系并无直接关系,但他父亲刘尚为刘宋时代越骑校尉,系汉置五校尉之一,据《宋书·百官志》:“越骑掌越人来降,因以为骑也;一说取其材力超越也。”“五营校尉,秩二千石。”(按:牟世金《文心雕龙研究》据《隋书》谓越骑校尉秩千石,盖误,秩千石乃陈制。)属四品,说明也是一个不小的官职,决非贫寒人家。只是因其父早死,才家道中落。这也涉及刘勰为什么“不婚娶”的问题,过去研究者认为他是因为“家贫”或“信佛”才“不婚娶”的,但这都缺乏说服力,他虽入定林寺十余年但并未出家,他家道中落是事实,但还不至于穷到无钱婚娶。这个问题也许可以从上面说到的日本中村圭尔《刘岱墓志铭考》中对南朝士族联姻状况的考察得到一些启发。中村在他的文章中举出了很充分的例证,说明南朝不仅士庶之间不通婚,而且士族中不同层次之间一般也是不通婚的。刘勰由于父亲早死,到他应该成家的年龄,家境已远非昔比,四品官吏的门第和实际衰落的现状,形成了很大的矛盾,婚姻上已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矛盾之中。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不婚娶”是因为“家贫”,但并非无钱婚娶。因此,他进入定林寺依靠僧佑,欲借僧佑的地位和影响,结交上层权贵,寻求仕途出路,也许是很自然的。

研究刘尚的情况还涉及刘勰是否确实生于京口、世居京口的问题。因为《梁书·刘勰传》并没有说他“世居京口”,杨明照先生在《梁书刘勰传笺注》中说刘勰“世居京口”,是根据《宋书》的《刘穆之传》和《刘秀之传》,按照刘勰祖父刘灵真与刘秀之是亲兄弟关系来确定的。如果刘灵真和刘秀之并非同父母兄弟,只是远房辈分相同,那么就很难说刘勰也一定是“世居京口”了。当然,刘勰的祖先属东莞刘氏,南迁后居京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其后是否有变化则是值得探讨的问

题。特别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刘勰父亲刘尚既为越骑校尉，当在京师供职，四品官的家眷很可能即在京师。他在刘勰年幼时去世，故刘勰也很可能出生于京师建康，一直居住在京师建康，而并非生于京口、居于京口。这与他后来入定林寺依僧佑也是有关系的，因为僧佑应萧子良邀请在京师宣讲佛法，声名大振，刘勰很可能因此受到影响。刘勰家在京师自然有机会多次听僧佑讲论佛法，也了解僧佑在当时社会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他和萧子良等南齐当政人物的密切关系。刘勰若是居于京口，又幼年丧父，家境衰落，如何能有机会听僧佑讲论佛法、接近僧佑，并入定林寺依托僧佑，而又不出家呢？刘勰为什么“不婚娶”和是否“世居京口”这两个问题我以为是目前研究刘勰身世中论述得不充分和还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其原因是由于大家对刘勰父亲刘尚的情况缺乏研究，也不够重视。刘勰的父亲刘尚何时为刘宋越骑校尉，何时去世，去世原因，均世无明文，已不可确考，但这与了解刘勰身世、确定刘勰生年是有关系的。台湾李日刚、王更生、龚菱以为是“病逝”，均无依据。牟世金《汇考》以为是元徽二年(474)战死于建康，亦为猜测之说，他所说的一些根据亦可商榷。我们从刘宋时之越骑校尉之任职状况中可以看出：除元嘉元年(424)至大明七年(463)的四十年中，越骑校尉之职可考者仅三人外(即：元嘉二十三年之张永、孝建元年之王景文不拜、大明年间之刘秉)，大都可以查考，无同时任职者。诚如《宋书·百官志》所说，自泰始以后，确多以军功为此官，而并无复员。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刘宋六十年中自大明八年(464)至元徽二年(474)这十年中，越骑校尉之职是安排得比较满的，只有泰始四年至六年(468—470)之间，刘尚有可能任越骑校尉。根据刘勰幼年丧父，又从三十岁后开始写《文心雕龙》，公元498年以后才完成的情况看，刘尚任越骑校尉也不大可能在大明七年(463)以前或元徽三年(475)后。《梁书》未言刘尚任过其他职务，又说“勰早孤”，说明刘尚死得很早，而越骑校尉属四品，不是一开始为官就能当的，所以他当是死于越骑校尉任上。如果刘尚是在大明七年前任越骑校尉，则刘勰生年应在此之前几年，最晚也在460年前后，则下距《文心雕龙》写成达四十余年，《文心雕龙》该不会写了近十年吧；如果刘尚是在元徽三年(475)后任越骑校尉，则

刘勰生年最早也要到 470 年左右,下距《文心雕龙》写成不到三十年,这就不符合“齿在逾立”始“搦笔论文”。因此,刘尚之为越骑校尉可能性最大的是在 468—471 年这段时间之内。(关于刘尚任职的情况,我在《有关刘勰身世几个问题的考辨》一文中有详细考证,文章收入我的《文心与书画乐论》一书。)

第三节 关于刘勰的生年和入定林寺的时间与原因

刘勰的生年史无明文,一般都是依据对《文心雕龙》成书年代的考订而推算出来的。因为《文心雕龙·序志》篇中有“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之语,可见他开始酝酿写《文心雕龙》大约在三十岁刚过不久。但是,《文心雕龙》究竟写了多长时间、确切成书于何时,也颇难确考。对此,历来有不同看法。现存各种版本《文心雕龙》一般都题“梁刘勰撰”,故也有人认为是成书于梁代。但是大多数学者还是同意清代刘毓崧《通谊堂文集·书文心雕龙后》一文中的意见,认为书当成于南齐末年。刘毓崧的这个看法,论证比较充分,从目前来看仍是不可推翻的。其云:

《文心雕龙》一书,自来皆题梁刘勰著,而其著于何年,则多弗深考。予谓勰虽梁人,而此书之成,则不在梁时,而在南齐之末也。观于《时序》篇云“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箴,世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高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遐(原注:遐,疑当作熙。)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云云,此篇所述,自唐虞以至刘宋,皆但举其代名,而特于齐上加一“皇”字,其证一也。魏晋之主,称谥号而不称庙号,至齐之四主,惟文帝以身后追尊,止称为帝,余并称祖称宗,其证二也。历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贬,独于齐则竭力颂美,绝无规过之词,其证三也。东昏上高宗之庙号,系永泰元年八月事,据“高宗兴运”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以后。梁武帝受和帝之禅位,系中兴二年四月事,据“皇齐驭宝”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以前。